

引子

## 中国救助流浪儿童机构诞生于唐代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恤孤养老慈善机构诞生在唐代。武周时期佛教兴盛,长安、洛阳及地方各道、州的佛寺住持经营慈悲田养病坊,收养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。朝廷对佛寺的善举给予经济资助,这种机制发展了百余年。

年。

宋代是中国古代最重视慈幼事业的王朝,救助流浪儿童进入专业化阶段。北宋初期,慈善机构和唐代一样,往往孩子和老人乞丐病人一起养,蔡京当政后,给予孤贫小儿免费上学

的机会,这种教养结合的救助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鸦片战争后,中国慈幼事业向近代转型。西方教会主办的孤儿院、育婴堂、盲哑儿童学校等遍布全国。

本土慈善家群体也发展壮大,以上海为中心,成立了一批养、教、工三者结合的民间救助儿童机构。比较著名的有高凤池、李平书、王一亭等人 1906 年筹款创立的上海孤儿院,曾铸创办、盛宣怀捐助的上海贫儿院等。

# 民国实业家熊希龄裸捐救助流浪儿

2012 年 11 月 16 日,贵州毕节五名男孩,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,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。这则不幸的新闻让救助流浪儿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在连年战乱、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,儿童流浪乞讨现象严重,张和平以上海街头乞儿为原型创作的《三毛流浪记》,牵动几代人的心。但也是那一时期,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群体成长起来,救助儿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壮大。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,且因为社会环境变迁,难以复制,但那些先驱的精神和经验,仍是今天值得借鉴的遗产。



香山慈幼院的家庭总部公共游戏室



熊希龄

## 【香山慈幼院】29 年共养育 7000 多名孤贫儿童

### 二百多孤儿无家可归,香山慈幼院开张

北京香山如今是旅游胜地,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它几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词。发起这项事业的是熊希龄。他是晚清翰林,主张维新立宪,1913 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理,因不满袁世凯独裁,不到半年就愤而辞职,彻底退出政坛。当时他已经 44 岁,本打算在天津隐居终老,但 1917 年夏,直隶一场大水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看到大批儿童和父母失散,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头插标贩卖,熊希龄忍不住悲叹:“可怜这些孩子,他生下来并无罪恶,为何遭此惨累呢?”

熊希龄回到北京,主持水灾督办处,同时利用自己

### 有钱人家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进来

熊希龄希望香慈能够成为一所先进的现代学校,而不是儿童收养院。他邀请蒋梦麟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张伯苓等数十位著名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,还与蔡元培、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进香慈教育。到 1926 年,香慈发展为包括 6 个分院的综合性慈善教育机构。一院为蒙养部,即幼儿园;二院为小学部;三院为中学和师范部;四院为职业教育部;五院为技工部,半工半读;六院为大学部。慈幼院学生中学毕业后如考取大学,该部负责为他们提供学费和解决各种问题。因为香慈教育先进,师资雄厚,连一些有钱人家也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

### 早在 1934 年已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

1949 年,奥地利创办世界第一个国际 SOS 儿童村,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。香慈早在 1934 年就已开始这种实践。在与慈幼院孩子接触中,熊希龄发现,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亲情温暖,性格孤僻,这个问题不是给他们良好的课堂教育和衣食条件就能解决的。熊希龄投资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平房小院,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按家庭编制分配,十几个孩子一组,住进一个院,互称兄弟姐妹,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师作为“娘”。熊希龄以“总家长”自居,设立家庭总部,邀请各家孩子来作客。

### 熊希龄去世,夫人继承遗志坚持经营

1937 年,北平沦陷。熊希龄和毛彦文试图将香慈迁至江西、湖南等地,但战火蔓延之迅速超出他们想象。1937 年 12 月,熊希龄因悲愤交加、过度操劳,突发中风去世。

毛彦文继承其遗志,坚持经营香慈,直至 1949 年,她迁居台湾。同年,中共中央进驻北平,看中山香山易于防空便于警卫,副院长雷动与理事长雷洁琼商议后,将香慈 3000 多间房子借给中共中央办公。香慈搬至西安门大街,1953 年迁入阜成路新校舍,直到 1966 年,这个新中国最后一家私立学校,走到历史终点。

从 1920 年至 1949 年,香慈共养育 7000 多名孤贫儿童,将他们培养成才,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

的声望和资源成立了两所临时慈幼局,一所男校,一所女校,委托好友英敛之收留 1000 多名流浪儿童。灾情缓解后,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认领回家,但还有 200 多个孤儿没有亲人来接走。熊希龄决定,将临时学校扩建,开办慈幼院。

北京城内没有可以开设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,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斡旋协商,前清内务府同意,出让废弃的香山皇家园林静宜园,即今天的香山公园。1920 年 10 月,香山慈幼院开张,熊希龄任院长,他同时也是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。

进来。

职业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。该部设有农业、畜牧、养蜂、陶工、金工、织染、制鞋、照相、银行等职业班;还曾办过高级土木工程科、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。职教部不仅培养高级工程师,香慈中小学部的学生也都要到这里学习劳动技能。

香慈的老毕业生说,如果不是熊希龄,香山的红叶不会像今天这么繁茂。香山园林荒废期间,旗民常来砍伐古树。慈幼院成立后,不仅制止砍树,还发起植树节,每年组织师生植树护林。

1931 年,和熊希龄并肩经营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。为纪念亡妻,熊希龄将两人共同的财产全部捐给香慈,成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,共有大洋近 28 万元,白银 6.2 万两。1935 年 2 月,66 岁的熊希龄与 37 岁的民国名媛毛彦文结婚,婚后毛辞去教师工作,专职辅佐熊经营香山慈幼院,老夫少妻共襄慈善,一时传为佳话。香慈董事会认为,熊希龄既已再婚,应将一半产业归还给他,以作日常家用,但夫妇二人都坚决拒绝。后来董事会决定,每月发给熊家 800 元生活费。

会计长盛长忠、水文专家谢家泽、新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建章、邮电部部长王子纲、外交部副部长张勃川等。

著名的双清别墅,原是熊希龄住所,现已成香山名胜。创办香慈初期,熊希龄在香山北辛村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熊氏墓园,他的双亲和夫人朱其慧都葬在这里。熊希龄在香港逝世后,骨灰埋葬在当地。1992 年,受定居台湾的毛彦文委托,香慈校友会代表赴香港将熊希龄骨灰迎回香山。熊希龄在世时,把每年 7 月 7 日定为香慈“回家节”,毕业的校友在这一天回母校“探亲”。如今,香山慈幼院虽已不存在,但一到 7 月 7 日,仍有许多白发苍苍的校友到香山聚会,那是他们永远的家。

## 【土山湾孤儿院】学艺出众的孩子还被送去欧洲深造

从晚清至民国的 100 多年间,教会是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主力军。尽管教会孤儿院的管理质量良莠不齐,“文化侵略”的背景也颇受质疑,但其开创的“教、养、工”三结合的方式,对本土儿童救助机构具有深远启发意义,尤以上海土山湾孤儿院最为著名。

1847 年,江南发生水灾,一位法国传教士在松江设立孤儿院收容灾民弃儿。经过十余年发展,同治年间迁至上海土山湾。孤儿院开创之初设立了鞋作和木工两个部门,后来逐步扩展出风琴作、图画间、印书馆、照相部、中西鞋作、五金部等部门。木工部以制造教堂工艺品著称。

除了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,许多父母健在的贫民子弟也被送进土山湾。这里不仅保障基本的衣食,更重要的是提供完善的职业技

术教育,让孩子学到维持生计的手艺。从 1864 年到抗战爆发前夕,土山湾孤儿院共收养男童 2500 余人。读完 6 年小学后,进入工厂实习两年,两年后,管理修士根据孤儿的才能和爱好,将其分派至各部门学习专门技艺。每日工作达 9 个小时,晚间还要学习文化课和宗教课,训练可谓十分严酷。严师出高徒,土山湾学艺出众的孩子,还将被送去欧洲深造。

日军侵入上海后,土山湾孤儿院在租界中虽然未受侵扰,但也因战事影响走向衰落。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收回租界主权,土山湾划归上海教区,不再受法国政府庇护,工艺产品的海外销路大打折扣。1956 年,全国开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,经过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改革,1960 年,土山湾孤儿院结束了近 100 多年的历史。

## 【战时儿童保育会】组建于国家存亡关头,格外重视教育

抗战爆发后,中国各地流浪儿童激增,仅武汉一地,难童已过万。在多方努力下,1938 年 1 月 24 日,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成立。

保育会成立后,工作人员每天到车站、码头、街市、兵营旁、难民收容所等地,招收流浪儿童;还有一批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,到战事最为激烈的徐州、开封、郑州等地,抢救出数千名难童。四川、成都、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儿童保育分会,共建立保育院 54 所。在宋美龄的号召下,各分会一般由当地行政首长夫人出面主持,妇女界、教育界、宗教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,负责具体工作。

儿童保育会组建于国家存亡关头,在照顾儿童衣食起居的同时,格外重视对儿童的教育。一方面,在日常教学中特别强调爱国主义、抗战形势等政治课程;一方面,注重生产劳动教育,以使儿童也能参与生产救国。劳动内容有开荒种地、饲养家禽等。男生要学木工、理发、打草、制肥皂、做豆腐等;女生学做衣服、做布鞋、织布、织毛巾等。对一部分年龄较大的难童,则

安排进行职业培训,如护士、木工等。

在管理上,由于难童数量庞大,教职人员有限,各保育会自创了许多儿童自治的政策方法。如浙江第二保育院的孩子成立了“战时儿童抗日自卫队”,下设训练、生产、卫生、教育和生活五个部门。卫生部下设整洁团,整洁团下有洗衣队、缝纫队和看护队。“每月一次全院儿童被套的洗涤和消毒,每个院童服用品的分别编号,4 月份 60 多个麻疹病童的看护,都是他们自愿地执行与完成”。

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部的孩子,学着边区大人样子,按照普选制度的办法,选择自己所爱护的代表,组织乡政府,领导小朋友的学习、生活和课外活动。

在诸多矛盾中,战时儿童保育会坚持八年,救助儿童近 3 万名。许多孩子成长为精英,包括画家伍必端、作曲家杜鸣心、指挥家陈贻鑫、中央乐团副团长杨秉荪、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华瑛、中国芭蕾舞团副团长蒋祖慧等。

据《文史参考》报道